

文本的异变:文天祥《集杜诗》的生成与早期流传*

涂 亮

内容摘要:《集杜诗》是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凭借自己的杜诗记忆与有限的杜集版本完成的重要作品。在其生前已经由人从狱中抄出,流行于燕市。而手稿南传后,更经族人刊刻,广为流播。元末战争导致《集杜诗》流传渐稀,明人从内阁录出,并广为搜访民间的旧藏本,通过建立祠堂、刊刻书籍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人们对于文天祥的社会记忆。在此期间《集杜诗》还经历了元代对忌讳之语的改动以及明代的复原,逐渐形成现今所见《集杜诗》的基本面貌,也大大增强了文天祥作为忠节典范的社会地位。另外《集杜诗》与通行的杜集之间存在较多异文,这些异文的产生具有多重因素,不应简单地使用杜集校改之。

关键词:文天祥 《集杜诗》 文本生成 版本源流

《集杜诗》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创作的重要作品,它不仅展现了文天祥与杜甫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的“异代共鸣”,在集句诗创作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这部作品将原本游戏性质的集句诗改为严肃的创作,融入“纪实”与“褒贬”的元素,从而扩大了集句诗文体的内涵,以此文天祥的《集杜诗》被赋予“诗史”^①的美誉。如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韩所藏中国古逸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73)及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宋元之际志士文献的生成与流衍研究”(KY-CX24_0053)阶段性成果。

①《集杜诗》有“诗史”之称,向为人所公认。《四库全书总目》即明确说:“《文信公集杜诗》四卷,一名《文山诗史》,宋文天祥撰。”(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259页)追溯其源,宋人连文凤(1240—?)《读文丞相宋瑞诗》其二“何年得见忠臣传,且把君诗当史看”(杨镰主编:(转下页)

称：“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可不谓之诗史乎？”^①《四库全书总目·文信公集杜诗》提要亦云：“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②正是由于文天祥的创作实践，使“集句”手法成为“诗史”作品中全新的表现形式。因此《集杜诗》作为集句诗中极为成功的作品，颇受关注^③。

但这样一部极具特殊性的作品，我们对其文本生成及版本源流的认识还不太清晰^④。《集杜诗》的文本有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它经由文天祥的杜诗阅读，以“集句”的形式诞生于异国监狱。书成之后不仅穿越元、明、清三朝，更历经手稿、单刻、全集、总集等不同形态，这些都增加了其文本生成与流衍的复杂性。本文尝试探讨《集杜诗》的产生和早期样态，对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系列相关问题进行阐释。

一、狱中《集杜诗》的成书及手稿的南传

宋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于广东海丰被俘，经长途跋涉，至第二年

(接上页)《全元诗》第13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431页)已经论及文天祥诗具备史的特质，而元明间刘崧(1321—1381)《仰斋诗》吟咏旷怀所得文天祥百篇集杜句原稿，即称“凛其直笔，允矣诗史”(刘崧著，郑利华、邓富华点校：《刘崧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933页)，直接指出《集杜诗》有“诗史”之称。以为“文山诗史”之称自明代刘定之(1409—1469)始(侯体健：《〈集杜诗〉：三重文本张力下的“诗史”建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146页)，则不够准确。

①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序类》，中华书局，1959年，第346页。

②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8册，第5259页。

③详参张福清：《20世纪以来文天祥〈集杜诗〉研究综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37—40页。又有侯体健深入文本考察，认为《集杜诗》运用组诗结构，“副文本”小序，以顺承、改变、切断语境等多种方式，将文字游戏与宏大主题、史实叙事与情感抒发、诗歌经典与自我创造三重冲突有机融合一体，是“一人之史”与“一国史”的艺术再现(侯体健：《〈集杜诗〉：三重文本张力下的“诗史”建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139—147页)。

④目前对文天祥集版本研究最为深入的是邓碧清《〈文山集〉版本考》(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曾枣庄指导)，1988年)以及《〈文山集〉版本考》(《宋代文化研究》第二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5—216页)，然限于时代条件，尚有不少问题。而对《集杜诗》版本研究的专论则阙如。

十月抵达大都,十一月初九日后^①移兵马司监狱。而《集杜诗》正是文天祥就义前在监狱中创作的作品。他通过专集杜甫的五言诗句,对过往经历进行系统总结。其创作经过可由书前自序得知:“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岁上章执徐,月祝犁单阏,日上章协洽,文天祥履善甫叙。”其后又有跋云:“是编作于前年,不自意流落余生,至今不得死也……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书。”^②按太岁纪年法^③,上章执徐为庚辰,是为元至元十七年(1280),与壬午(1282)年之跋称“前年”相合,祝犁单阏为己卯月,是为农历二月;上章协洽为庚未,然六十甲子中并无庚未,疑传写有误。据此可知《集杜诗》完成于至元十七年二月^④。

《集杜诗》与文天祥的其他狱中作品不同。由于是集句的性质,他如何在监狱中获取杜诗原句,并将之剪裁成篇,是讨论其成书的首要问题。过去通常认为《集杜诗》来源于文天祥的记忆。这种说法从元代即开始盛行,如元李祁《仰斋记》曰:“当宋祚既迁,信公以执节不屈下燕狱,于狱中日,记忆杜句,集五言为百首。首凡四句,亲书而跋,其后密遣,遗其家人。”^⑤李祁见过旷氏所藏百首《集杜诗》原稿(详后),或因其与杜集之间异文较多,故产生了这样的推测。文天祥文集校点者刘文源也在《文天祥诗集校笺》凡例中称:“《集杜诗》二百首是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凭记忆

①文天祥:《集杜诗·至燕城第九十六》小序,刘德清等校点:《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19页。

②《文天祥全集》,第858—859页。

③宋亡后,文天祥为保存志节,不书元年号。因此时间标注主要采取干支纪年法以及太岁纪年法两种。《指南后录》有《发彭城》一诗云:“我爱陶渊明,甲子题新诗。”(《文天祥全集》,第760页)即表现出对陶渊明用干支纪年的肯定。此外《吟啸集》中《逢有道者》一诗序云“岁祝犁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涪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文天祥全集》,第841页),是另一使用太岁纪年法的案例。此诗作于岁己卯、月丑、日甲申,也就是己卯年(1279)十二月十一日,与《集杜诗》序的创作时间接近。

④《纪年录》辛巳(1281)注曰:“是岁囚……集杜甫五言句,为绝句二百首。”(《文天祥全集》,第1015—1016页)所述《集杜诗》完成时间比文天祥《自序》所载迟了一年,盖注者误记。

⑤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七,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索书号:00635),叶四。

写成的。”^①亦有当代海外汉学家持相似的观点,美国学者戴仁柱提到:“当文天祥在狱中写这些诗歌时,他显然无法利用私人藏书,由此只能主要靠记忆来创作,而在青年时代,文天祥就已致力于记诵杜甫篇幅庞大的诗集。”^②戴氏虽言及文天祥青年时期的记诵行为,但并未对此进行论证。而文天祥前期诗文中确实有相关记载,如《生日和聂吉甫》诗中有“细咏诗工部,闲评字率更”^③句,而《新淦曾季辅〈杜诗句外〉序》云:“杜诗旧本,病于篇章之杂出,诸家注释,人为异同……予受而读其凡,盖甚爱之,既录其副。”^④可见文天祥对杜诗确实精研有年,于其版本情况亦有殊见。

但《集杜诗》所参引的原诗数量庞大,很难仅凭记忆完成。据考察,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除去现今各版本均缺的“徐榛第一百三十四”,共 796 句,至少采集自 300 首杜甫的五言诗^⑤。《集杜诗》之外,在文天祥大量创作杜诗集句的庚辰年里,还有《胡笳曲》十八首及各集未收的文山《集杜句和韵》一首(附于汪元量《妾薄命呈文山道人》^⑥诗后)。《胡笳曲》共 160 句,其中七言 138 句,五言 12 句。《集杜句和韵》均为五言,共 30 句。由此可见文天祥创作杜诗集句的知识储备还要更多,涉及杜甫各类五七言诗。他不仅需牢记全部内容,还要灵活地进行剪裁与创作,确实具备相当的难度。

文天祥在狱中真的如戴仁柱所言,完全“无法利用私人藏书”吗?他的确无法将南方的藏书携带在身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狱中与外界完

①文天祥撰,刘文源校笺:《文天祥诗集校笺·凡例》,中华书局,2017年,第3页。

②[美]戴仁柱著,刘晓译:《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③《文天祥全集》,第62页。

④《文天祥全集》,第475页。

⑤王家琪:《文天祥〈集杜诗〉的叙事结构与对杜诗之接受》,《兴大中文学报》第23期(2008年),第233页。而刘华民谓“文天祥的《集杜诗》采自381首杜甫的五言诗”(刘华民:《文天祥诗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68—69页)。由于《集杜诗》本身标注诗句出处会有部分偏差,而王氏文章附录中有2个表格分别统计文天祥《集杜诗》所集杜甫诗句出现次数在2次以上和1次者,并逐一列出,因此较为可信。

⑥《妾薄命呈文山道人》诗前为《庚辰正月旦早朝呈留忠斋》。而文天祥《胡笳曲·序》谓“庚辰中秋日”及同年十月,汪元量两访文天祥于囚所(《文天祥全集》,第786页)。这些都说明文天祥的《集杜句和韵》也创作于庚辰年。

全断了联系。据笔者考察,至少有如张弘毅等随侍的南方士人^①,或是如汪元量等探访的亲友^②,甚至是其周边的北人吏士能与他接触。前两个群体自不必赘言,至于后一种,《纪年录》壬午年(1282)之注文引邓光荐(1232—1303)《文丞相传》云:“公因〔囚〕系久,翰墨满燕市。时与吏士讲前史忠义传,无不倾听感动,其长李指挥、魏千户奉事之尤至。”^③由是可见,尽管当时的条件艰苦,但由于文天祥独特的影响力,其在狱中仍然通过多种方式与外界保持着联络。而邓光荐《文丞相传》亦言:“麦述丁参政尝开省江西,见公出师震动,每倡言杀之便,又以公罪人,下千户所收其棋奕(弈)笔墨书册。”^④更是直接说明了在政治形势尚好的入狱初期,文天祥身边是存有棋弈笔墨书册的。因此访监之友或受其感动之吏士依旧可能为他提供一个杜诗读本,尽管这个读本可能是书肆之本,或抄本,或残本,并不精良。

文天祥在狱中阅读杜诗的情况,更能从其自述中得到直接印证。如文氏《集杜诗》自序云:“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⑤其《指南后录》又有《读杜诗》一首^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氏自述的“诵”“读”“玩”等字眼。“记诵”,正是通过反复的有声“诵读”来达到“记”的目的,自然是有一个书面文献呈在目前^⑦,与他人所推测的仅凭“记忆”不同,这说明

①元人宋无《睢宁集》中《张千载》诗自注:“文山自广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来见曰:‘丞相赴北,某亦往。’遂以故宋官营求江西省咨之北,寓于文山囚所侧近,日以美食奉之。”(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9册,第446页)

②陈建华:《文天祥与汪元量狱中唱和诗探析》,《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五期,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第103—129页。

③《文天祥全集》,第1017页。按,景泰刻本“因”作“囚”,“囚系”为词,应是。

④《文天祥全集》,第1017页。

⑤《文天祥全集》,第858页。

⑥《文山先生遗墨》中保存有文天祥《读杜诗》真迹,并题“正月八天祥书”,写作时间很可能是至元十七年(1280)正月(文天祥:《文山先生遗墨》,明正德九年张祥刻本,叶五十一)。而刘文源将其编年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八月(文天祥撰,刘文源校笺:《文天祥诗集校笺》,第1308页),并无判断依据。

⑦参见陆胤:《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记诵”》,《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第11—14页;李晓田:《“声音景观”与“阅读规范”——宋代士人对读书声的诗学呈现与文化构建》,《中国诗歌研究》2023年第1期,第160—177页。

文天祥此时尚可见到一杜诗文本,并通过诵读杜诗,自我排遣。《正气歌》中有言:“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①此句若为写实,亦是文天祥在狱中可获得书籍的旁证。正是狱中的特殊环境,使得文天祥所能凭借的杜诗版本受到限制。而有限的杜诗版本与文天祥自身的杜诗记忆一起构成其创作《集杜诗》的知识基础。

《集杜诗》完成后,距壬午年末文天祥就义,尚有近三年的时间。由于文天祥在当时即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生前所创作的诗文早已传播开来。时人于此颇有记载,如邓光荐《哭文丞相》曰:“北人传好句,大半狱中成。”^②刘岳申(1260—?)《文丞相传》云:“其为诗有《指南录》,《前录》三卷,《后录》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诵之。其翰墨满燕市。”^③《纪年录》辛巳年(1281)之注文也称:“公在縲绁中,放意文墨,北人争传之。”^④可见他在狱中创作的诗文在当时已经外传,被当地民众传播阅读。其具体流出情形大概如文天祥《胡笳曲》序所述:“庚辰中秋日,水云慰予囚所……水云别去,是岁十月复来。予因集老杜句成拍,与水云共商略之。盖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学谈语也。水云索予书之,欲藏于家,故书以遗之。浮休道人文山。”^⑤同为集杜句且完成时间接近的《胡笳曲》正是由汪元量带出牢狱的,故《集杜诗》亦可能有相同的经历。由此可知,在当时能接触到文天祥的人都可能将其手稿带出,让他的作品流向社会,被大众阅读。

当时流传得较为广泛的文天祥作品集,主要以《吟啸集》《集杜诗》这类狱中创作的作品为主。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其八曰:“有诗有诗《吟啸集》,纸上飞蛇喷香汁。杜陵宝唾手亲拾,沧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长留国风什,鬼神呵护六丁立。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呻吟泪痕湿。呜呼八歌兮歌转急,魂招不来风习习。”^⑥此诗完成于文天祥就义后不久,仅提及文天祥《吟啸集》及《集杜诗》,又言“纸上飞蛇”“我公笔势”,似是就其

①《文天祥全集》,第 801 页。

②《文天祥全集》附录二,第 1195 页。

③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1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558 页。

④《文天祥全集》,第 1015 页。

⑤《文天祥全集》,第 786 页。

⑥汪元量撰,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 年,第 79 页。

手稿为言^①。另有何梦桂(1229—1303)《文山诗序》云:“沙场青冢,千古南音,其所流落人间者,惟有流离中《吟啸诗史》与狷狂中《杜诗集句》耳。使人读之,至今凛凛有生气……生刍一束,酹酒北酹,为之序云。”^②以其经历^③及语气度之,何梦桂似乎也在文天祥逝后不久为文氏流传在外的诗集作序。与汪元量诗同,此序仅及《吟啸集》和《集杜诗》,与元代文天祥后人编纂的全集本不同,亦未涉及更早成书的《指南录》,进一步印证了文天祥生前广泛流传的作品集应当是《吟啸集》与《集杜诗》二部。另外道体堂本《文山先生文集》元贞二年(1296)冬至日序云:“其曰《吟啸》者,乃书肆自为之名,于义无取,其实则《指南》别集耳。”^④可知《吟啸集》在早期已有书肆本行世,《集杜诗》的情况或同此。只是这两部著作陆续从狱中抄出,未必为全本。正如当时之《吟啸集》亦与现存之《吟啸集》有较大出入一般^⑤,可能是书肆为迎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将所收集到的稿件实时加以编刊传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当时社会对文天祥的重视,不仅是宋遗民,连元人也为之折服。

文天祥就义后,《集杜诗》手稿与其骸骨、须发一起南传。《集杜诗》壬午年文天祥自序云:“斯文固存,天将谁属?呜呼,非千载心,不足以语此。”^⑥“千载心”为何人?王炎午《又望祭文丞相文》曰:“已而庐陵张千载

①汪元量《读文山诗稿》诗云:“一朝禽瘴海,孤影落穷荒。恨极心难雪,愁浓鬓易霜。燕荆歌易水,苏李泣河梁。读到艰难际,梅花铁石肠。”(汪元量撰,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第88页)

②何梦桂著,赵敏、崔霞点校:《何梦桂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

③何梦桂《答文山谢诗序》云:“岷峨神奇字已漫,昌黎去后孰跻攀。平生有道碑无愧,幸托先生翰墨间。”(《何梦桂集》,第93页)又《和文山先生》云:“坐对烟煤冷麝脐,一窗风雨懒幽栖。蚕丛国破鹃啼血,王谢堂空燕落泥。华表有时归老鹤,桃都何处听天鸡。十年往事俱尘土,莫上扬州唱竹西。”(《何梦桂集》,第50页)可见何氏与文天祥颇有交集。其亦有《和岳文二公西湖韵》《吊岳文二公二首》等诗,对文天祥忠节推崇备至。

④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1455)韩雍、陈价刻本(索书号:02330),叶一。

⑤《吟啸集》在当时又有《采薇歌》之称,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二共录40首,无一例外均在现存《指南后录》中,与现存《吟啸集》不同。

⑥《文天祥全集》,第859页。

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①可知为张弘毅。此外杨士奇《跋文山集杜句》云:“初公得死后,吉水土人张弘毅,自燕以公爪发及遗文归,而此诗亦在其中。”^②进一步说明包含《集杜诗》在内的遗文是由张弘毅带归的。而张弘毅带归《集杜诗》的时间可以从文天祥归葬庐陵的时间推断,《纪年录》注引邓光荐《文丞相传》云“至元二十年癸未岁,公柩归至故里”^③,可知《集杜诗》南传的时间在文天祥就义后不久。

由张弘毅带归的《集杜诗》原稿,元明间于庐陵地区传播。文天祥的孙女婿旷作楫得到了约百首作品,这些作品在动乱中被保存下来,并在元代文人群体中产生重要影响。元李祁《旷作楫墓志铭》记载:“初,文信公以狗国入燕,系燕狱,于狱中集杜少陵五言为绝句凡百首,亲书以付其家人。其孙女得之,以归于夫家。仓猝揭揭避寇,珠玉金贝,悉委弃不顾,独挈此卷置衣袖中得完,怀至今袭藏之。使故家文献,庶几有足征者,是皆可采录也。”^④此外王礼《旷作楫行状》曰:“君讳某,字某,姓旷氏,庐陵西里人也……辟斋阁,藏书籍……君生戊申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八……三娶文氏,则信国公从孙也。男一人,曰怀。”^⑤旷作楫又将手稿传给其子旷怀,文天祥的精神也在其家族中代代传承,为后人所瞻仰。旷怀更设“仰斋”,以示对文天祥的纪念。李祁《仰斋记》曰:“庐陵旷君维宁……乃独取其家藏故宋丞相文信公手书集杜句一帙,日展而玩之,袭而珍之,又为之斋阁以藏之。盖将因其文以想其人,因其人以慕其行,非徒取其翰墨之精妙而已,故名其斋曰‘仰斋’。”^⑥刘崧《仰斋诗》小序亦云:“宣溪旷怀得故宋丞相文山信国公燕狱中所集杜句五言绝句一百首于其母文夫人,蚤受读而感焉。夫人,丞相曾孙行^⑦也。上距作诗时八十有八年,而翰墨犹新,编帙具在。怀惧其藏之弗谨,乃构斋居为崇笈以庋之,而

①《文天祥全集》附录一,第1139页。

②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98年,第137页。

③《文天祥全集》,第1018页。

④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5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35页。

⑤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6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35—736页。

⑥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七,叶四。

⑦此处言“曾孙行”与前引墓志铭中“孙女”、行状中“从孙”辈分相冲突。文天祥子女死于战乱,故以其弟文璧子文陞为嗣子,“孙女”“从孙”意指同。应以墓志铭、行状为确。

揭之曰‘仰斋’，示高山仰止之意也。雩阳提举李公既为之记矣，里生刘某复申之以诗。”^①可见旷氏对先祖的手稿非常小心珍重，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仍然“翰墨犹新，编帙具在”。

除旷氏收藏的《集杜诗》百首外，亦有他人收藏之。刘崧在《跋文丞相书集杜感兴绝句》中介绍了他见到的《集杜诗》原稿：

按丞相当宋亡之三年，始被执留燕狱，五年而就义。又后九十三年，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访求丞相当日事，罕有能言者，盖遗老尽矣……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书“嵯峨阆门北”集杜感兴绝句一首，凡廿有八字，复摹公像于左方装潢成轴，请有以识之。忆余三十年前尝过郡城邓侍郎孙谦，见丞相所书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岁，又获观行书小轴于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书以寄其舅氏曹君天锡者。近丙午岁，又获见草书大册五十首于庐陵旷氏。其卷帙大小长短率不等。意当时丞相所书若是者，类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士夫之宝藏居多。由兵兴以来，其存亡有无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仅存者也。其指意虽不可考知，而笔势顿挫劲拔，如龙跳虎跃，不可玩狎，视余前所见数本，又大加而特异，是岂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北山，庐陵人，年几七十矣，其敦行尚义，盖有自云。^②

这段材料说明，《集杜诗》原稿的形态各有不同，“类非一本”展现了其复杂性。同时交代了其字体为草书，且“笔势顿挫劲拔，如龙跳虎跃”，或不易辨别。其中“‘嵯峨阆门北’集杜感兴绝句”即为《集杜诗》中的“苏州第五十四”。文中所提及的“邓侍郎孙谦”，为邓光荐孙邓谦。刘崧又有《观邓侍郎石磬歌》序称：“侍郎讳光荐，字中甫，庐陵人……至正丁亥春，余过公故宅，其孙谦出以示余。”^③因邓光荐与文天祥及其后人之间联系紧密，所以也获得部分《集杜诗》真迹。

刘崧所得真迹，于其身后又为陈谟（1305—1400）所获见，其《书文丞相燕南感兴集杜四绝句后》云：“刘君子高为北平副使，得文丞相集杜四绝句以归，笔势飞动，与蛟龙薄日月、伏光景者争雄，可为希世之宝。子高已矣，其子士鸿出以示余，且求为志之。”^④此文所言四绝句亦当为“苏州

①刘崧著，郑利华、邓富华点校：《刘崧集》，第932—933页。

②刘崧著，郑利华、邓富华点校：《刘崧集》，第1311—1312页。

③刘崧著，郑利华、邓富华点校：《刘崧集》，第201页。

④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7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

第五十四”一首。此真迹后又传至万历年间胡直(1517—1585)处,其《书神留宇宙卷后》云:“是为文信国集杜绝句墨迹,有予邑陈海桑先生题跋。予少尝假阅陈氏……垂三十年,是书归予友王有训氏,有训遂请诸先师罗文恭公题曰‘神留宇宙’,续跋其后。又七年,予起畎亩,将行,有训携以赠予,予谢不可……予于是再拜受,而识诸卷尾。”^①之后则未有文献记载此卷之流传,或已亡佚。至清代仅刘嗣綰(1762—1821)有《文信国书杜诗卷》诗曰:“正气千秋尚浩然,特留翰墨镇山川。鲁公笔势风霜入,杜老诗篇日月悬。碧血久埋柴市地,晴虹常贯米家船。漂流玉带生何处?眼底冬青哭杜鹃。”^②可知他见到了文天祥集杜诗真迹,但未详具体篇目。

上文所述刘崧(泰和人)、陈谟(泰和人)、胡直(泰和人)、罗洪先(吉水人)等均属庐陵(今吉安)人。在文献手稿的收藏者中,不仅有文氏后人,乡邦后进亦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元明以来乡邦意识的凸显,构成了文献典籍特殊的流传网络。江西吉安地区自宋代起便以“文章节义之邦”而著称,地方上昌明文教、推崇科举,并涌现出以“五忠一节”为核心的先贤群体。其中,文天祥作为与当地关系最为密切的杰出代表,其生平事迹与庐陵紧密相连,成为庐陵文化的象征。元初刘将孙曾高度评价文天祥:“历考三百年间,生庐陵,长庐陵,以科目荣庐陵,以宰辅称庐陵,以精忠大节重庐陵,独文山信公一人止,岂但一代之无二!自庐陵来,山水之钟英,亦仅在乎此也。”^③深受庐陵文化影响的士人纷纷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其中不乏权掌中枢者,他们致力于提拔后进,进一步推动了庐陵文化的繁荣。后人也因此更加尊崇乡贤,共同促进乡邦文化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二、元版《集杜诗》的传播与讳改

《集杜诗》在手稿南传之后,于文天祥的家乡庐陵地区刊刻,但目前未见有元版《集杜诗》传世,无法直接考察其版本情况,仅可通过历代文献的记载钩沉抉隐^④。元版《集杜诗》在后世有两种传播路径,一是藏于

^①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十八,明万历刻本,叶七至八。

^②刘嗣綰:《尚絅堂集》诗集卷二,清道光大树园刻本,叶二。

^③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6页。

^④元修《宋史·艺文志》中并无文天祥著作的记载,其虽编纂于元末,然并非宋代著述目录,其蓝本为四种《国史艺文志》,仅补充了少量嘉定以后的图书,故理宗朝之后的典籍多有缺失。

民间,一是藏于内府。明初杨士奇《跋文山集杜句》云:“右信国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狱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初公得死后,吉水土人张弘毅(即序中所称千载心者),自燕以公爪发及遗文归,而此诗亦在其中。乡郡旧尝刻公遗文,兵后板废,今士大夫家间存其本。永乐丙申,余于京师遇此诗,及《督府忠义传》,遂录藏之。”^①说明由张弘毅带归的包含《集杜诗》在内的文天祥遗文确实在元代的“乡郡”(吉安)刊刻。但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在明初仅少量收藏于士大夫家中,之后更少见明代藏书家记载。直至晚清黄绍宪(1862—1897)明确说明其收藏有元本《集杜诗》,有诗《旧藏元印本文信国狱中〈集杜诗〉二百首,宪久欲有作,懒病未能,节盒题〈四和香词〉,谨和六绝句》^②。节盒即梁鼎芬(1859—1919),其《四和香》词序云:“黄三出所藏元刊《文信国集杜诗》,属题,盖口中作也,感而赋此。”词云:“正气歌成诗更烈,字字悲宫阙。石烂海枯心不歇。谁得及、铮铮铁。一卷麻沙精妙绝,来历犹能说(乾嘉朝士题识甚佳)。我欲读之喉更咽,君试看、斑斑血!”^③“一卷麻沙精妙绝”说明该本或为福建麻沙刻本,仅为一卷或不分卷。其自注云“乾嘉朝士题识甚佳”,可见此书经过清乾嘉士人递藏,只不过是否为元刊尚存疑。

清代其他言及《集杜诗》之旧本者,尚有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云:“《文信公集杜诗》四卷。宋文天祥撰。文氏刊本,一名《文山诗史》。〔续录〕曾见旧刊本,十行二十字,题《文山诗史》,疑是宋元刻。”^④目前可见《集杜诗》单刻本中,未有“十行二十字”行款者,应是一别本。李一氓跋清初抄本《文山先生集杜诗》云:“予别见一本,有季振宜藏书印刻入板侧,拟似以元本(?)复刊者。”^⑤其中提到季振宜藏本。缪荃孙言翁方纲曾以此本参校,云:“《文山先生集杜诗》二卷,明刻本……翁氏手跋曰:……丙辰二月以季沧苇所藏旧本校一遍,其本有‘谦

①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卷十,第137页。

②黄绍宪:《在山草堂烬余诗》卷六,影印清宣统三年(1911)南海黄氏铅印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③梁鼎芬著,廖宇新校注:《梁鼎芬词校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8页。

④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63页。

⑤李一氓著,吴泰昌辑:《一氓题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65页。

牧堂藏书’印记。”^①可知其所校季振宜本,又经揆叙收藏。以上均称季振宜本为旧本,或疑为“元本”,而《季沧苇藏书目》正著录有“《文山集杜》一本”^②,然是否真为元本,有待证实。

除私人收藏外,明代内府也藏有多部文天祥文集,可惜的是并未保存至今,现依据明代内府藏书目录的记载进行考证。其中至关重要的史料是明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人编纂的《文渊阁书目》及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萱等人编纂的《内阁藏书目录》。虽然这些明代官修书目的记载都颇为简略,但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藏书目录的对比与分析,仍可窥探出丰富的细节。

据考察,存世之《文渊阁书目》可分为漫堂抄本、四库本和塾本三个系统,每个系统反映的是文渊阁不同时期藏书的情况^③。就明文渊阁所收藏的全集本系统文天祥文集而言,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文集”类“荒字号第六橱”中著录:“《文山文集》五册,又八册,荒五百八十一。”^④四库本系统《文渊阁书目》在宋人文集处残缺二百余种,正好包含文天祥文集,故此部分无法考察。而塾本系统《文渊阁书目》卷九“文集”类“日字号第三厨”著录:“《文山先生文集》一部五册,全。《文山先生遗文》一部八册,残缺。”^⑤《内阁藏书目录》卷三载:“《文山先生文集》五册,全。

① 缪荃孙撰,黄明、杨同甫标点:《艺风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28页。

② 林夕主编,煮雨山房辑:《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第20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1页。

③ 漫堂抄本系统时间最早,是正统六年杨士奇等初步整理文渊阁藏书时藏书的状态;四库本系统其次,是正统六年文渊阁藏书整理完毕的状态;塾本系统最晚,是万历三十三年编著《内阁藏书目录》前对文渊阁藏书进行核查时的藏书状态(详参刘仁:《〈文渊阁书目〉版本系统考论》,《文献》2019年第4期,第119—133页)。

④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不分卷,国家图书馆藏宋氏漫堂抄本(索书号:15851)。后引该目均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⑤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九,清嘉庆顾修《读画斋丛书》本,叶三十三。按,“五册”原作“六册”,而作为《文渊阁书目》节抄本的《秘阁书目》文集类著录为:“《文山先生文集》五。”(钱溥:《秘阁书目》,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上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64页)今本《菘竹堂书目》亦作:“《文山先生文集》五册。”(题叶盛:《菘竹堂书目》卷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上册,第919页)故校改之。

宋丞相文天祥著,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①结合书籍存佚情况及《内阁藏书目录》中的卷数记载可知,五册本的《文山先生文集》当为元代元贞、大德间所刊道体堂刻本。现存元贞二年道体堂《文山先生文集》序云:“又如《年谱》《集杜》《指南录》,则甲戌己后之笔,不在此编。”^②可知其中未包含有《集杜诗》等文天祥后期诗文。《内阁藏书目录》卷三还著录有:“《文山先生全集》十册全,同前人。又六册不全。”十册本的《文山先生全集》在此前目录中并未出现,其书名为“全集”,显然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所编刊的数种《文山先生全集》之一,并非元版,应是新入藏内府的书籍;而“六册不全”者或为前已著录的原八册本《文山先生遗文》,可能由于卷首缺失,编者未知具体书名,故附于此。关于该书的具体内容将于下文详考。

除了全集本之外,内府中还藏有多种单行本的文天祥集。与《集杜诗》紧密相关的是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诗集”类“荒字号第八橱”所著录的“《集杜句诗》一册,荒八百三十三”。四库本系统《文渊阁书目》卷二“诗词”类“月字号第一橱”称:“《杜诗集句》一部一册。”^③塾本系统《文渊阁书目》卷十载:“《杜诗集句》一部一册,阙。”^④《内阁藏书目录》中未有该书的记载,可知此书在万历三十三年之前就已经遗失了。值得注意的是“杜诗集句”之称与何梦桂所言书名同,因此该书很可能是元代文天祥《集杜诗》的单行本。另外,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诗集”类“荒字号第九橱”还著录“《文丞相诗》一册,荒一千六十五”。四库本系统称:“《宋文天祥诗》一部一册。《文山吟啸集》一部一册。”^⑤塾本系统载:“《宋文天祥诗》一部一册,阙。《文山吟啸集》一部一册,阙。”^⑥可惜这类一册本的诗集也已遗失,无法确认其中是否含有《集杜诗》。

幸运的是,现存广泛利用明代内府藏书编撰而成的《永乐大典》对

^①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卷三,民国张钧衡《适园丛书》本,叶三十二。后引该目均同此,不再重复出注。

^②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首,明景泰六年韩雍、陈价刻本,叶一。

^③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四十八。

^④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十,清嘉庆顾修《读画斋丛书》本,叶三。

^⑤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五十五。

^⑥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十,清嘉庆顾修《读画斋丛书》本,叶十六。

《集杜诗》颇有采集。据目前已知的《永乐大典》残本^①统计,有《祥兴》《北行》《思故乡》《挽先生》《写本心》等,共 55 首(见表 1),占现存《集杜诗》总量的四分之一强。由于《集杜诗》的成书时间与明永乐年间相隔不久,加之其特殊的文体性质,元代的总集和类书中很少会对其作大规模的选录,因此根据文体性质及编纂时代等推测,《永乐大典》通过他书转引的可能性不大,其在各韵下的零散引用,应该来源于原书。

表 1 现存《永乐大典》所录《集杜诗》一览表

卷次、韵目	来源	内容	备注
《永乐大典》卷八九九 “诗”字韵	文天祥集	《写本心》 第一百六十三 至一百九十一	29 首,无标题 及诗序
《永乐大典》卷六六四一 “乡”字韵	文天祥诗集杜句	《思故乡》第一百 五十六至一百 六十二	7 首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五 “汀”字韵	文天祥集	《汀州》第六十五	1 首
《永乐大典》卷七九六二 “兴”字韵	文天祥文山集 杜句	《祥兴》第三十三 至三十九	7 首
《永乐大典》卷七九六二 “兴”字韵	文天祥诗	《又过隆兴》 第八十四	1 首,《文天祥全 集》作“过隆兴”
《永乐大典》卷八五七〇 “生”字韵	文天祥集杜句	《挽先生》第一百 三十六	1 首,无诗序,《文 天祥全集》作“曾 先生”,同时每句 后亦无杜诗原题
《永乐大典》卷八六二八 “行”字韵	宋文天祥遗文集 杜句	《北行》第九十 至九十五	6 首
《永乐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簿”字韵	文天祥文山集	《刘监簿》第一 百二十九至第一 百三十	2 首
《永乐大典》卷一五一三九 “帅”字韵	文天祥文山集	《淮西帅》第二十五	1 首

^①本文主要利用的是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1986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2003 年)以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永乐大典〉》(2016 年)、《永乐大典 卷 2272—2274》(2021 年)及《缉熙堂藏〈永乐大典〉》(2023 年)等。

表1可见,《永乐大典》在引用“集杜句”之前,会有“文天祥诗”“文天祥集”“文山集”“文天祥遗文”等多种称谓来说明其引用的来源。虽然《永乐大典》各韵目下的零散引用并不会严格按照书名进行著录,但这样的称谓也说明《永乐大典》中所引“集杜句”的来源不完全是单行本的《集杜诗》。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八九九“诗”字韵“宋诗八元诗一”事目下选录了《集杜诗》中的《写本心》二十九首。这一事目以宋元人诗作,特别是标题中含有“诗”字者为主,之所以选录《写本心》,或许是由于其属于“集杜(句)诗”。此外,《写本心》前有《题毛霆甫诗集》,后有《清江河汉英再见于空同读欧阳先生诗感慨为赋》,这两首都是文天祥早期诗歌。这些诗文的来源统一题作“文天祥集”,则其所据不可能是仅包含文天祥前期诗文的道体堂本,而是一个同时含有其前后期诗文的版本。

此外,《永乐大典》卷八六二八引用集杜句《北行》时称其来源为“文天祥遗文”^①,共六首。现存文天祥文集中,未有称“文天祥遗文”者。但前述《文渊阁书目》著录有“《文山先生遗文》一部八册”。此外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纂修的《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云:“信公遗稿,在元时类集五十卷,公之孙富刻板传世。经兵燹不全。”^②与前引杨士奇言“乡郡旧尝刻公遗文,兵后板废”相合。因此《文山先生遗文》很可能就是一直以来未被确认的文富编刻本。文富作为文天祥嗣孙,曾于元统元年(1333)刊刻刘岳申《文丞相传》,并请许有壬作序。而刘岳申在《文丞相传》中记载了他所知道的《指南前后录》的卷数,即“其为诗有《指南录》,《前录》三卷,《后录》五卷”^③。因此,若以道体堂本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为基础,加上《指南录》三卷、《指南后录》五卷以及《集杜诗》二卷、《纪年录》一卷,正为五十卷。由此推知,《永乐大典》所引《集杜诗》的来源或许并不相同,但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以《文山先生遗文》为代表的全集本系统。

在内阁中见到元本《集杜诗》的还有刘定之(1409—1469)。他不仅详细介绍了元本的具体情况,更重要的是还将其从内阁录出,成为明刊本的底本。从刘定之序及抄出的版本中,可以窥见元本《集杜诗》的基本情况。其《文山诗史序》云:“予少时得宋丞相信国公文公《指南集》读之,然闻

①解缙等:《永乐大典》卷八六二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3986页。

②刘文源编:《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14页。

③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1册,第558页。

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诗》，未见也。及官词林，始见而录得之。”^①据《明史·刘定之传》，“刘定之，字主静，永新人……举正统元年会试第一，殿试及第，授编修”^②，故其从内阁录出《集杜诗》当在正统年间。刘定之序又云：“诗皆古体，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为四卷，首述其国，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终以写本心、叹世道者……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后私，尽己以听天，于此亦可以见。而俗本或混之，今皆为复其初……不书纪年者，陶靖节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谓范睢变张禄、越蠡改陶朱之意也。”^③该本卷前的文天祥自序，不书其名，只作“姓某”。而壬午正月元日跋语也不在自序之后，却在“后卷上”的《家枢密铉翁第一百三十八》诗之末，也题作“姓某”。显然是有意为之。据考察，前卷及后卷上的内容即刘定之所言“首述其国，次述其身，次述其友”，写的是国家动荡之际文天祥及友人的抗争与努力，属于“公”的领域。后卷下自《坟墓第一百三十九》起则为“次述其家，而终以写本心、叹世道者”，属于“私”的领域。可见文天祥确实有意将“公”“私”二者分开。其言“俗本”并未按照顺序排列，可知俗本在刘定之本之前已有流传，很有可能就是从狱中抄出、未经文天祥编集的版本。而文天祥特意于壬午正月重新题跋，或是对其旧稿进行了重新编排。

此外刘序还称：“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书，使知者以意属读，今皆补之。而为白字者，不没公初意也。”^④可见刘定之所见的元本《集杜诗》有不少缺字。据笔者统计，被刘定之发现且增补的地方共有七十余处，多补为“虏”字及贰臣姓名。这类元代版本的“缺文”现象颇值得注意。除了刘定之所见本外，《永乐大典》所录《集杜诗》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改动形式有所不同。如《永乐大典》所录《祥兴第三十四》诗前小序：“己卯正月十三日，泛舟直造崖山。世杰不守山门，作一字阵以待之。及入山门，作长蛇阵对之。二月六日，又乘潮进攻，半日而破，死溺者数万人。哀哉！”^⑤“泛”“及”“又”三字，应非文天祥小序之原貌。由句意可知，此三处主语当为南下的元军，然而整句中无一处言

①文天祥：《集杜句诗》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天顺刻本（索书号：01070），叶一。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七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4691页。

③文天祥：《集杜句诗》卷首，明天顺刻本，叶一至二。

④文天祥：《集杜句诗》卷首，明天顺刻本，叶一。

⑤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七九六二，第3696页。

及,不符合语法习惯。而刘定之所见内阁本三字均缺,故以意补作“虏”字。此外又如《永乐大典》“刘监簿”小序“寻引军入广,道遇兵,溃亡”^①，“兵”字刘定之所见本亦为空缺,刘定之补作“虏”。因此《永乐大典》所录很可能为另一源流的别本,其对忌讳词语采取的处理方式是改字而非挖空。同时《永乐大典》所引“淮西帅”小序中有“夏贵”及“孙虎臣”等贰臣名^②,刘定之所见本为“□□”及“□虎□”。由此可见,《永乐大典》所引本并未改动贰臣姓名。文天祥的著作被元人讳改,在其他著作中也有出现,如《指南录》中亦存在类似的讳改现象^③。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元代文网并不密,甚至称之为“意外的松弛”^④,其实未必如此,文天祥等人的相关著作正是考察元代政治忌讳的重要材料。

《永乐大典》所引与刘定之所见本在文字面貌上还有其他不同,非因讳改所致。如刘定之本《祥兴第三十五》小序“世杰于战败后乘雾雨晦冥以数舟去”,“去”^⑤,《永乐大典》所引为“至朱崖”^⑥。这在文字上并没有致误之由,而是反映出两种不同源流文本的面貌。当然在文字的讹脱方面,二本也各有胜意。如《永乐大典》所引《祥兴第三十六》小序中“惜世杰不知合变,专守法”^⑦，“专守法”,刘定之本作“专守一法”,显然更符合文意。而《永乐大典》引《淮西帅第二十五》“水花笑白首”句后题“《送王砾使南海》”^⑧，“送”,刘定之本作“进”,当为形近之误。

如前所述,文天祥在狱中的创作,是受限于创作条件的多时段创作,未经历正常著作预刊时的誊清稿本过程,未冠有一个确定的书名,卷数也未经统一。《纪年录》注者云:“参之公所著《指南前后录》《集杜句诗》前后卷,旁采先友遗老话旧事迹,列疏各年之下。”^⑨由此可知,元代名之为

①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一四六〇八,第6493页。

②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一五一三九,第6817页。

③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刊元修本《新刊指南录》,对“虏帅”“北虏”“大酋”“胡”等民族语汇,以及“吕师孟”“伯颜”等人名都会进行删改。

④详参陈正宏、谈蓓芳:《中国禁书简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13—132页;罗鹭:《元代的文化政策与图书出版》,《出版发行研究》2020年第9期,第98页。

⑤景泰刻本、成化刻本作“遁去”。

⑥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七九六二,第3696页。

⑦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七九六二,第3696页。

⑧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一五一三九,第6817页。

⑨《文天祥全集》,第983页。

《集杜句诗》，且分为前后两卷。刘定之所见明内阁藏本亦称《集杜句诗》，与此相合。而前述杨士奇所见、《永乐大典》所引本等称《集杜句》。可知其最早流传时应作《集杜句》或《集杜句诗》，后亦有《文山诗史》之称，收录于全集本后才统称为《集杜诗》。

总而言之，就元代的《集杜诗》而言，确实存在单行本与全集本两种形态，而刘定之所见的《集杜诗》应与《永乐大典》所录不同，分属两个系统。通过对二者的研究及对比，可以管窥元时文本的特殊面貌，对探究与恢复《集杜诗》原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宋元之际志士文献受到元代特殊政治文化影响的典型案例。

三、《集杜诗》在明代前期的刊刻与复原

《集杜诗》在明代最早的刊刻记载，见于孙承泽《宋丞相文信国祠》：“宣德四年（1429），保定李庸为府尹，重拓其祠。信国所著，有《目录》《吟啸集》《指南录》《集杜二百首》，并刊板祠中。”^①为此杨士奇还专门作《文丞相祠重修记》称赞云：“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谒公祠下，顾瞻祠宇，敝陋弗称，遵用诏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备具。又求刘传刻石，将使人人皆知世之为臣者，光明震动，焜焜烈烈有公也。”^②北京作为文天祥的死节之地，也是上述诸多作品的创作地，自然具备特殊的含义。只是这一系统的文天祥集以及刘岳申《文丞相传》刻石，均未流传至今^③。

现存最早的《集杜诗》刻本并非单行本，而是收录于全集本系统的明景泰六年（1455）韩雍、陈价刻本《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别集》六卷、《附录》三卷之中。此本将文天祥集分为三个部分，《文集》既与《别集》《附录》构成全集，又相对独立，版心分作“文山集”“文山别集”“文山附录”，各自计卷，每部分前还单独列有目录，展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别集》六卷包含卷一《指南录》，卷二《指南后录》，卷三《吟啸集》，卷四、卷五《集杜诗》，卷六《纪年录》，可见此本将《集杜诗》分作两卷，并置于《吟啸集》后、《纪年录》前。又因其为后世全集本系统之祖本，此编排顺序经多本因袭，影响深远。

景泰刻本的生成是在江西及吉安地方官员的主持下进行的，与明代

^①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二二，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320页。

^②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卷二，第28页。

^③现北京文丞相祠内尚保留有嘉靖二十八年（1549）王逊重刻石碑。

“土木堡之变”后特殊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其中《文集》十七卷的内容源自明内府藏元代元贞、大德间所刊道体堂本。韩阳《文山先生文集序》称：“翰林侍读文江尹先生居馆阁日曾录是集之全者。去年春，寅友陈君维藩按部至吉，先生出而示之。陈君求假以归，而呈于廷抚都宪韩公。”^①李奎《文山先生文集序》曰：“景泰癸酉春，宪副西蜀陈公价按行至吉，观省之余，访求遗稿，编次成帙，凡名公所述传记哀挽亦附录焉。”^②结合序文和其他证据^③可知，是尹凤岐^④从内阁录出道体堂刻本《文山集》，即《文渊阁书目》和《内阁藏书目录》所著录的五册本《文山先生文集》，并编次为《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而《别集》六卷及《附录》三卷则是由陈价于吉安访求获得，并非来自内阁。就其中的《集杜诗》而言，分作两卷，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景泰本附录卷三录有部分序跋，与《集杜诗》相关的只有杨士奇《题文山集杜句》，因此可能与杨士奇有所关联。由于景泰本为后世全集本的祖本，其文本流传较为稳定，《集杜诗》亦同。

如前所述，元刊本《集杜诗》中最大的特点是部分忌讳字眼空缺或有改动，而这一点在景泰刻本中并未出现，文中直接题写“虏”字及贰臣的姓名。更重要的一点是，刘定之所补的文字与景泰本所录也有不同，如景泰本《出使第五十六》小序“余见伯颜，开陈大义，词气慷慨，虏颇倾动”^⑤，“伯颜”，刘定之补作“大酋”。又如《家枢密铉翁第一百三十八》小序“当国都不守，先生签书枢密，见虏，持正议”^⑥，“虏”，刘定之补作“伯颜”等等，说明二者之间并非同一版本系统。

①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首，明景泰六年韩雍、陈价刻本。

②文天祥：《文山先生别集》卷首，明景泰六年韩雍、陈价刻本。

③《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究竟是尹凤岐还是陈价编次，学界有所争议。近藤一成首次指出在道体堂序文后有记云“《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予合而为一，姑存二序于此”，后更有双行小字注“以上俱旧籍所载”，而这个“旧籍”很可能是尹凤岐抄本（[日]近藤一成撰，尤东进译：《文天祥的“自述”与“他述”——以文天祥全集的编纂为中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第52页），其说甚是。

④尹凤岐，字邦祥，江西吉水人。明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初授翰林院编修，终官翰林院侍读，天顺三年（1459）三月卒。可见其久在内阁，因此得以有机会录出道体堂刻本《文山集》。

⑤文天祥：《文山先生别集》卷四，明景泰六年韩雍、陈价刻本，叶十四。

⑥文天祥：《文山先生别集》卷五，明景泰六年韩雍、陈价刻本，叶十二。

除忌讳字眼外,二本的其他内容亦有不同,现以《福安宰相第六十三》^①小序为例,其异文见表 2:

表 2 景泰刻本与刘定之所见内阁本异文表

原文	明景泰刻本	刘定之所见本
福安宰相第六十三	宰	再
余至通州,地分官以制置司文移为说,甚作艰阻。余不得已吐实,以通杨守帅思复。乃云:“谍报:许浦有马,根寻文丞相。”甚信余言,不直制司。	余、余、余	予、予、予
予然后得杨守存恤,遂遵南归。及过明州东门,有列岸数百艘,	遵	复
初不知为虜把隘船也。后闻之东门道士,	虜	□,补作虜
云是日虜头目见船过,问左右曰:“此何船?”皆以渔舟对,遂得善去。	虜	□,补作虜
呜呼危哉!杨守为余言,欲得海船数百艘,当约许帅文德拥兵勤王,	余、约、文德、拥	予、□、□、义
慨然有誓清之志。予至永嘉,即详报陈丞相,不以为信,乃遣毛浚之通州,	誓清	清肃
而不以告余。浚至通州,守问予何以无书,遂发怒,浚几不免。	余	予
浚出,而通遂降虜矣。惜哉	虜、惜哉	□、□

首先是作为主语的“余”与“予”多次出现不同,但景泰刻本中部分主语亦有作“予”的情况。其次各自有明显的误字,如刘定之所见本的“再”,景泰刻本的“遵”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定之所见本相较景泰刻本有阙文。如二本分别作“当约许帅文德拥兵勤王”“当许帅义兵勤王”,文意完全不同。由于“许文德”亦降元^②,故刘氏所见本此处很可能有阙字,加上“约”字脱文等情况,刘定之才将其抄录成另一种面貌。此外如“浚出,而通遂降虜矣。惜哉”,其中虽然可能有阙字,但读起来文从字顺,刘定之无法轻易发觉。因此,景泰刻本的文献来源,很可能是民间所流传的未因

^①文天祥:《文山先生别集》卷四,明景泰六年韩雍、陈价刻本,叶十七。

^②《宋史·李庭芝传》曰:“三月,夏贵以淮西降……已而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兴祖皆以粮尽降。”(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02页)

元代忌讳改字的版本,故在忌讳字眼上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同时刘定之从内阁抄补《集杜诗》时虽然态度谨慎,但其据己意所补的空缺,不一定符合文天祥集句的原貌。因此其与他本之间的不同,需要更为审慎的判断。

除景泰刻全集本外,明代前期《集杜诗》还有三种单刻本流传,分别是文珊刻本《集杜句诗》、卢崇绩重刊本《集杜句诗》及刘时让刊《文山先生集杜诗》。其中现存最早的单刻本是明天顺间(1457—1464)文珊刻本《集杜句诗》。该本分四卷,为前卷上、前卷下、后卷上、后卷下,后又附有张庆之《咏文丞相诗》。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黑口,单鱼尾,四周双栏,卷前署“宗孙禾川文珊录刊”。文珊属永新文氏,与文天祥同族,故有刊刻之举。其刻本直接源自刘定之抄补本,书前有刘定之《文山诗史序》云:“公同时有曰吴郡张子善者,亦尝集杜句述公始终大概,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证之。今内相安成彭公纯道得其本以示予,遂录以附公诗之后,合而题之曰《文山诗史》,取公序中语也。公之宗孙廷珮(引者按,即文珊)欲侵梓以广其传,乃序以归之。廷珮又尝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祀公,可谓贤后裔云。”^①故刘氏将从内阁中录得的《集杜句诗》,以及彭纯道(即彭时)提供的张庆之《咏文丞相诗》一并交由文珊刊行。此外《集杜句诗》书前刊载了柯暹与李贤为永新之祠所作的祠记,叙述文克纶、文珊父子建祠祭祀之由,说明文珊刊刻《集杜句诗》与扩建永新之祠之间的密切关连。

文珊刻本《集杜句诗》后又经卢崇绩重刊。卢崇绩重刊本现已不存,王伟《重刊文信公集杜句诗序》曰:“同年友翰林刘主静先生,已补其缺略次第之,公宗孙庭珮尝刊以传。今湖广宪副、淦邑卢公崇绩,病其板刻细小,难于检阅,特捐俸贖重加刊行,俾予序之。”^②卢秩,字崇绩,江西临江府新淦县(今属吉安市)人。明景泰五年进士,初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历湖广按察司副使,官至贵州按察使。黎淳《送卢崇绩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序》曰:“天顺昭阳协洽秋九月既望,河南道监察御史卢公崇绩以贤能遴选,拜湖广按察司副使。”^③又《明宪宗实录》载,成化六年(1470)九月“丙

^①文天祥:《集杜句诗》卷首,明天顺刻本,叶三至四。

^②《文氏统谱》卷十七载,转引自刘文源编:《文天祥研究资料集》,第328页。

^③黎淳:《黎文僖公集》卷十,明嘉靖刻本,叶四十。

申(二十一日),升湖广按察司副使卢秩为贵州按察使”^①。可见此本刊刻于天顺七年(1463)至成化六年之间。周弘祖《古今书刻》“湖广按察司”条著录“文信公集”^②应是指此书。

此外,现存明代较早的《集杜诗》单刻本还有明成化甲辰(二十年,1484)刘时让永嘉刊本《文山先生集杜诗》二卷。该本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双鱼尾,四周双栏。刘逊,字时让,号固庵,别号笋峰。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明成化十四年进士,初授永嘉县知县。该本后有杨守陟跋:“安成刘君时让以进士出宰永嘉,既新作文信公祠,又翻刻公之《集杜诗》以传……今公之祠,庐陵有之,京师有之;集杜之诗,江西刻之,湖南刻之,而永嘉之人睹公遗迹、仰公余烈者,犹以不得亲炙庙貌、家有诗集为恨。”^③所谓“江西刻之”即指天顺年间文珊刻本,“湖南刻之”即卢崇绩重刊本。跋中既言“翻刻”,故其底本自然应是一刻本。然而成化刻本与天顺刻本分卷、附录均不同。成化刻本仅分为前卷及后卷,书前为《文山先生集杜诗序》,并将壬午元日文天祥跋移至此序后。接着则是附录,首录杨士奇《题文山集杜句》,后为谢铎《永嘉文信公新祠碑》、刘逊《宋文信公祠堂记》、《永嘉岁祀文》、《文信国公祠堂图》等文献,并无刘定之等人相关序跋。之后才是《集杜诗》正文。书后为杨守陟跋,还特意以莲花式木格刻有《文信公北归宿温州江心寺诗》。其中特意将附录提前,文化建构的意味尤其明显。此外二版本之间异文众多,如成化刻本自序及跋不言“姓某”,而直接写作“文天祥”。就异文分布而言,成化刻本诗句的异文多存在于各诗小序,更有诗句来源与天顺刻本不同者。如天顺刻本《召张世杰第十七》“笳鼓凝皇情”后题“《赠郑国公严武》”,成化刻本为“《赠左仆射严武》”,其他不胜枚举。因此二者显非同一版本源流。

而成化刻本后也特别录有杨士奇跋,或与杨士奇有所关联。相较于天顺刻本,其更多与景泰刻本表现出一致性。二本均半叶十一行,文字面貌也更为接近。但成化刻本显然并不源自景泰刻本,二者之间仍存在不少异文。如景泰刻本《祥兴登极第三十二》小序“戊寅四月十七日,卫王

①《明宪宗实录》卷八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622页。

②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③文天祥:《文山先生集杜诗》卷末,南京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索书号:GJ/EB/111373)。

登极于碣川”，成化刻本“卫王”作“南王”。《祥兴第三十六》小序“他船皆闽浙水手”，成化刻本“他船”作“北船”等等。而《出使第五十六》诗序“而丞相吴坚、右丞贾余庆……及数虏罪恶”，刘定之所见本原文为“而左相吴坚、右相贾余庆……及数吕□□□□孟罪恶”。故刘氏补作“吕文焕吕师孟”，成化刻本则作“而左相吴坚、右相贾余庆……及数吕文焕、吕师孟”，特别是“虏”字，被替换为“吕文焕吕师孟”六字，且无“罪恶”二字。由此可见明代前期的版本各有其源，文字面貌亦颇复杂，而之后的版本多由其中而出。

总而言之，明代前期刊印的《集杜诗》形成了现今所见《集杜诗》的基本面貌（见图1）。其刻本的产生，并不是单一性质的翻刻，而是在时代渐远且兵后板废、文献渐稀的大背景下，为加强对文天祥的社会记忆而进行的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所以文集的刊刻往往与祠堂建设等纪念活动相关联，这些刻本大多将祠堂记、文集序、文天祥像等副文本与文集本身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了文献含量，也彰显了文化特色。同时文献的刊刻又会受到特殊人物、特殊时间及政治时局的影响。文献来源不仅涉及到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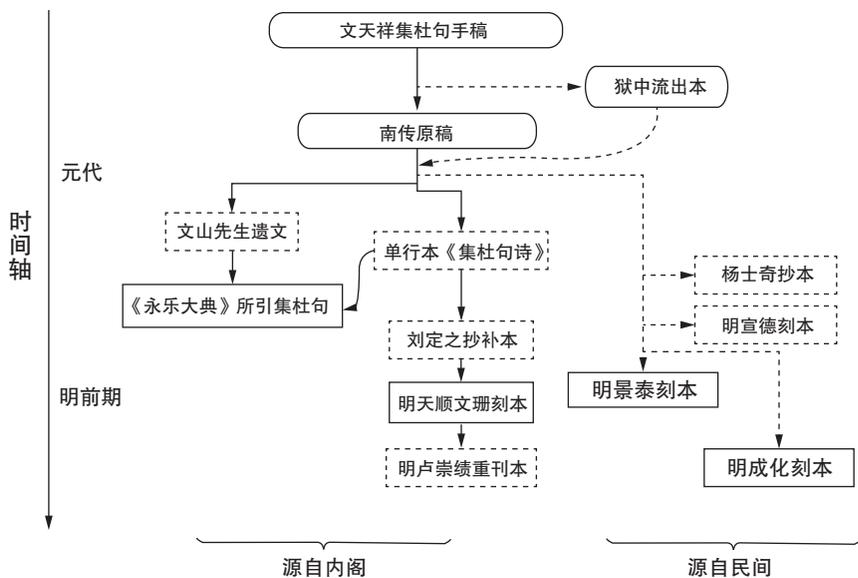


图1 《集杜诗》早期重要版本源流图①

①圆框表示文献统称，方框表示具体版本。虚线框表示该版本亡佚或未见，实线框表示该版本尚存。实线箭头表示直接的版本承继关系，虚线箭头表示尚未明确的版本承继关系。

阁与民间,就刊刻主体和地点而言,除亲族、乡人在当地的刊刻外,死节之地北京以及任职江西的官员们亦从事之,更涉及到吉安籍的地方官在与文天祥关系并不密切的温州^①、湖广等异地的刊刻,共同使得文天祥成为超越特定时代及特定地域的忠节典范。

四、杜集异文与校勘策略

上文已梳理《集杜诗》生成与早期流传的历史,此外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集杜诗》与杜集之间存在大量异文,大大超出一般集句诗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这个问题在前代《集杜诗》的流传与今人的整理与研究中已受到关注,但采取的方式多是利用通行的杜集进行修改。如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抄本《文山先生集杜诗》^②,其底本为明成化甲辰刘时让永嘉刊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八字,注文小字同。然其依杜集对原本进行了校勘,与杜集不合者均改从杜集。又如《四库全书》本《集杜诗》亦依杜集进行校改:“《文信国集杜诗》,宋文天祥撰。《祥兴》‘南岳配朱鸟’,刊本‘岳’讹‘北’,据杜集改。《南剑州督》‘江阁临石面’注‘简严云安’,刊本脱‘安’字,据杜集增。《过章贡》‘故里但空存’,案‘存’,杜集作‘村’。《怀旧》‘故乡不可思’注‘赤谷’,刊本‘赤谷’讹‘亦思’,据杜集改。”^③

现代整理本也是如此。如刘文源《文天祥诗集校笺》凡例称:“《集杜诗》二百首是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凭记忆写成的,因手边无原书查对,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故该卷以校为主,其杜集参校本为《杜诗镜铨》(清杨伦笺注)、《杜诗详注》(清仇兆鳌注)。”^④在刘氏的具体校勘中,多有利用杜集改字的现象。此外刘德清等校点《文天祥全集》也多用杜集进行校勘改字,对刘文源《文天祥诗集校笺》多有承袭。如《勤王第五十三》原文

①详参李世众:《忠义文化的地方化渠道——以温州孤屿文天祥祠的历史记忆建构为中心》,《史林》2023年第1期,第106—119页。

②索书号:40514683。此本书衣题“宋文文山诗史”。有“商之孙子”朱文方印、“双桂堂楚记”朱文方印、“参议公十世孙”白文方印、“世培手抄”朱文方印、“柳胥”朱文方印、“吴兴伯子世培”白文方印,或为祁彪佳抄本。

③王太岳等纂辑:《四库全书考证》卷八四,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叶二十五。

④文天祥撰,刘文源校笺:《文天祥诗集校笺·凡例》,第3页。按,其取清人注本作为参校本亦颇为可商。文天祥的创作时间是元初,故从史源的角度看,也应取宋末元初的通行本。

作“垂之俟来者(《苏源明》)”,《文天祥诗集校笺》《文天祥全集》校记均为“示来者,原作‘俟来者’,据杜集改”^①。又如《阳罗堡第八》原文作“日色隐孤戍(《登秦州》)”,校记云“孤树,原作‘孤戍’,据杜集改”^②。“大江声怒号(《大雨》)”,校记云“二江,原作‘大江’,据杜集改”^③。然而杜集在这些地方本身就存在异文,如凡例提及的参校本之一《杜诗详注》,分别作“垂之俟来者”“日色隐孤戍”“二(一作大)江声怒号”^④,不知校勘者的改动依据为何。此外在学者的研究中,亦多依杜诗是正,如莫砺锋《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称:“文天祥诗集的通行本以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为最佳,但其中的《集杜诗》字句舛误甚多,句下所注杜诗出处也时有错误,本文引用时即据杜诗随处改正,不再一一注明。”^⑤可见在对《集杜诗》的整理与研究中,运用杜集进行校勘改字,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然而这一点本身是可商榷的。简单地使用杜集来校改文天祥的《集杜诗》,即潜在地承认文天祥创作集句时完全承袭杜诗原貌、《集杜诗》与杜集的异文是后世传写产生的讹误。然而文天祥最初创作《集杜诗》时,真的是对杜甫的原文一字不改地集句吗?另一方面,他所参阅的杜诗版本,是否本身即存在版本的局限呢?直接用杜集改动《集杜诗》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古籍校勘的原则。集句诗带有二次创作的性质,应深入讨论《集杜诗》与杜集之间存在异文的原因,采取最适合的校勘策略,以便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

如前所述,《集杜诗》的生成与传播过程复杂,有北方流传之本,有南方刊刻之本。同时文天祥原稿文本形态各有不同,又为草书,在文本的辨识上亦增加了难度。故异文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因记忆错误而产生。加之文本的变异是来自后人的传写之误,还是文天祥的个人改写,二者显然有不同的意义。前者系在流变过程中产生的异文,可归于文献校勘范畴;后者属于创作,有之于文天祥本人的独特意义,

①《文天祥诗集校笺》,第1419页。《文天祥全集》,第891页。

②《文天祥诗集校笺》,第1363页。《文天祥全集》,第862页。

③《文天祥诗集校笺》,第1364页。《文天祥全集》,第863页。

④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406、674、908页。

⑤莫砺锋:《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3期,第49页;后收入《唐宋诗论稿》,辽海出版社,2001年,第518页。

从对杜诗在接受角度看,也有读者反映理论的独特价值。而文天祥是否进行过有意的改动呢?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每一诗句下均有文天祥的注文标明所采诗句之来源,并对杜集之原标题进行改写,主要呈现为长题缩写。如《渡江第十》“轻舟下吴会”,注云“逢刘簿弟”,诸版本皆同。杜集标题作“逢唐兴刘主簿弟”,校勘者据杜集补为“逢刘主簿弟”^①,而“簿”正是“主簿”之简称,添一“主”字,非其原貌。又如《怀旧第一百六》“访旧半为鬼”^②、《刘钦贡元第一百一十二》“感子故意长”^③、《思故乡第一百六十七》“世事两茫茫”^④后均注“赠卫处士”,诸版本皆同,亦可通,毋需如校勘者那样补作“赠卫八处士”。同时,文天祥对诗句来源或有误记,如《赵大监时赏第一百一十九》“平生白羽扇”注云“《严公武》”,实乃“《李光弼》”^⑤;《次妹第一百五十五》“天际伤愁别”注云“《出郊》”,实乃“《鄴城西原》”^⑥;《写本心第一百七十二》“惨淡苦士志”注云“《送李大夫》”,实乃“《送从弟亚》”^⑦;《写本心第一百八十五》“开怀无愧辞”注云“《咏怀》”,实乃“《大云寺》”^⑧等等。这些文字无法推寻讹误之迹,难以查考致误之由,故只可能是作者之误。对于作者之误,不能与流传之讹误等同视之,仅可在校记中说明,不应出校纠驳,甚至直接改动。

除诗句来源之外,杜句本身亦出现文天祥有意改动之处。如《将军王安节第四十七》“惆怅汗血驹”,诸版本均同,杜诗原句为“倜傥汗血驹”^⑨。“惆怅”有“悲愁、失意”之意,“倜傥”则为“洒脱不羁”之意。王安节为敌生擒,不屈而死,于意而言当与“惆怅”合。又如《杜大卿泚第一百三十三》“埋骨已经秋”,诸版本均同,杜诗原句为“埋没已经秋”^⑩。其

①《文天祥全集》,第 864 页。

②《文天祥全集》,第 925 页。

③《文天祥全集》,第 928—929 页。

④《文天祥全集》,第 965 页。

⑤《文天祥全集》,第 933 页。

⑥《文天祥全集》,第 959 页。

⑦《文天祥全集》,第 967 页。

⑧《文天祥全集》,第 974—975 页。

⑨《文天祥全集》,第 886 页。

⑩《文天祥全集》,第 944—945 页。

诗小序云：“在虏网罗中，无所容力，寻闻死焉。哀哉！”^①“埋没”虽有掩埋之意，而无所指，“埋骨”则正对应杜泚之死。再如《思故乡第一百六十九》“今吾抱何恨，恨无匡复姿”，诸版本及《永乐大典》所引均同，杜诗原句分别为“今君抱何恨”及“我无匡复姿”^②。文天祥将二句略为改写，并形成一個緊密的整體，以表現其無法匡復宋室之恨。由此可見，文天祥雖採用集句的方式，但確實對杜句原文進行了改動。

除了傳統校勘學之外，也應從閱讀史的角度來探討《集杜詩》的文本生成。拋開後世的傳寫之誤，集句異文的產生還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文天祥的記憶以及在獄中所獲見的文本已經發生變異；二是文天祥在其記憶與見到的文本間作出有意識的選擇；三是文天祥就原句語境予以再創作^③。這要求我們更加重視文天祥作為杜詩讀者的身份，在閱讀與接受之後，他成為新的創作者，由此產生的眾多異文需要得到更審慎的對待。因為這並不是杜甫詩集的一個版本，而是文天祥通過閱讀、思考而重新創作的作品。

總而言之，流傳至今的《集杜詩》是一個多層次的文本，學者們在整理與利用時，應廣泛收集《集杜詩》的各種版本，在分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根據其版本層次確定底本與校本。並利用宋末元初的通行杜集進行校勘，分清傳寫之誤與作者之誤以及作者改寫諸情形，以求在更大程度上還原《集杜詩》的本來面目。同時在閱讀《集杜詩》時也應留意，詩句的內容除了杜詩本身的所指外，再創作時或許注入了超越原詩的更深層次的含義。無論是校勘還是閱讀，都不應僅僅依照杜詩的面貌來看待《集杜詩》，而應以“知人論世”的視角，通過文天祥的生命歷程和閱讀經歷，理解《集杜詩》的價值。

五、結論

《集杜詩》是在特殊歷史情境中形成的作品，產生於文獻資料匱乏的敵國監獄，融合文天祥的杜詩記憶及有限的資料而付諸文字。不僅經過手稿的北方傳寫與南歸後的刊刻，還經歷了元代的諱改以及明代的“復

^①《文天祥全集》，第944頁。

^②《文天祥全集》，第966頁。

^③此處受葉晔《〈牡丹亭〉集句與湯顯祖的唐詩閱讀——基於文本文獻的閱讀史研究》一文（《文學評論》2019年第4期，第179—180頁）启发。

原”。在复杂的版本流变后,于明代前期形成现今所见《集杜诗》的基本面貌。由于文天祥特殊的历史地位,明前期以后的版本也较为繁复,并产生了新的流衍,值得继续探讨。

《集杜诗》的生成、编刻与流衍是内部版本演变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文天祥的忠节典范形象也逐渐确立,成为时代动荡中民族精神的丰碑。《集杜诗》文献源流复杂,文化价值巨大,是展开文献文化史研究的绝佳样本。

本文初成于2022年,间有修订;曾于2023年11月11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日近世近代诗学研究会2023年度第一回会议”上宣读,得到内山精也老师、金程宇老师的批评指正,受益良多。同时感谢外审专家及武秀成老师、史洪权老师、侯悦、时鹏飞等人的宝贵意见。

【作者简介】涂亮,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版本目录学、域外汉籍。

(上接第94页)

对于写本装帧形态的理解,有助于缀合更多残片,推进敦煌文献整理工作。这一点,已为前贤丰富的研究所证实。而对于写本装帧形态的复原,也是我们迈向写本学的基础工作之一。其能为中古书籍史的研究提供更多关于写本形态方面的细节,为写本学奠定更为坚实的研究基础。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高奕睿(Imre Galambos)教授、荣新江教授、史睿副研究员、罗慕君副教授、英国图书馆 M \acute{e} lodie Doumy、Han-Lin Hsieh、法国图书馆 Nathalie Monnet、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 Irina Popova、Alla Sizova 的帮助。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冯婧,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研究方向:敦煌学、写本学、书籍史。